



# 集体跳崖的英雄壮举

## ——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碑文敬读

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矗立着“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碑名由开国上将萧克题写。碑高105米，底座长9米、宽3米，呈火炬状，碑主体右为红军团军旗，左为困牛山，上面镌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旗山融为一体构成丰碑。纪念碑底座正面的正中间，镌刻着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困牛山战斗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简介》，两边依次镌刻着红军将领颜吉连、李真、张铨秀、陶汉章、江文等五位少将的题词和《建碑记事》。《简介》全文如下：

1934年8月，奉中革军委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两个师六个团计9758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10月5日红六军团五个团进入石阡县。

7日，遭遇桂敌，甘溪战斗失利，红六军团被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24个团重围。红六军团分头突围，主力转战大地方、佛顶山、聚风、本庄、瓮溪、川岩坝，15日抵龙塘朱家坝，准备从板桥渡石阡河去印江。不料湘敌李觉8个团，黔敌王天锡3个团和柏辉章部及地方民团先抵板桥渡，敌我咫尺。

16日即农历甲戌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困牛山战斗打响，军团部从朱家坝向南转移，初二进甘溪出石阡。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红18师52团800多壮士断后，拖住全部湘黔敌和地方法团，战斗到最后的百余红军战士，面对步步逼近的敌和被迫走在敌前面的百姓，不便展开战斗，边打边退，直到悬崖边。为不做俘虏和避免误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团长田海清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7日军团部重抵甘溪，18日在贵阳冷家榜屯告中革军委石阡突围胜利，24日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在印江县木黄会师，完成长征先遣队的任务。

师长龙云率200余人冲出困牛山重围，在寻赶军团途中于岑巩县龙颈



坳受伤被俘，就义于湖南长沙（后经史料考证，龙云就义于武汉——引者注）

困牛山战斗是红六军团粉碎敌军“会剿”和“歼灭”企图，胜利突围出石阡的战斗。百余红军战士为革命勇于献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感天动地，是英雄壮举，是爱民壮举，是民本壮举，诠释了红军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

困牛山红军壮举永垂青史！  
困牛山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红二方面军后代  
中共石阡县委  
石阡县人民政府  
二〇〇九年六月

碑文记述了红六军团为完成长征先遣队任务、粉碎敌军“会剿”和“歼灭”企图而展开困牛山战斗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的历史背景和作战过程，高度评价了百余红军战士宁死不屈、宁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千古壮歌。敬读碑文，对革命先烈的崇

敬和缅怀之情油然而生。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酝酿向湖南西部地区战略转移，计划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以期扭转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

1934年8月7日，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领导的正在湘赣苏区进行反“围剿”斗争的红六军团，从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向湖南中部一带前进，执行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并联络红三军，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侦查探路的重任。全军团西征出发时共9700余人。

从8月底至10月初，红六军团连续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10月7日，红六军团进入石阡县甘溪镇，与桂军发生遭遇战，部队被敌军截为三段。面对国民党军24个团的重围，军团首长决定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到石阡以西人烟稀少的山区艰苦转战，以寻机突破敌人的包围。为尽快突围，担任后卫的红六军团18师第52团奉命改为前卫，奔赴险峻

的深山老林中寻找道路。

10月15日，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前往印江与红三军会合。担任前卫的第52团进至板桥附近时，遭遇湘军堵击，又陷入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中。10月16日，根据军团命令，红六军团18师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第52团800余人，由前卫改为后卫，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向甘溪地区转移。为保证军团主力顺利转移，全团指战员奋勇抗击敌军，将敌人一步步引向困牛山，致使激战后剩下的400余名红军战士全部陷入敌军重围之中。

困牛山位于贵州石阡县龙塘镇境内，在山的南、西、北三面有险峻河环绕，山谷幽深，悬崖壁立，极为险峻。第52团红军退到困牛山时，四周高山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为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龙云率200余人攀悬崖下到河沟突围，田海清率100多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上顽强阻击敌人。红军战士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伤亡惨重，但田海清不幸牺牲。16日下午，面对英勇抵抗的红军战士，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胁迫当地老百姓走在他们前面当“肉盾”，向红军战士一步步逼近。红军指战员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了悬崖边上。在这生死危急关头，他们宁死不当俘虏，也坚决不对老百姓开枪，毅然从困牛山集体跳崖，跳下了数十米深的虎井沟。除个别红军战士被树枝拦住幸存外，大部分壮烈牺牲。第52团余下指战员在国民党军重兵堵截中壮烈牺牲，龙云、岑冈等地，大部分战死，龙云受伤被俘，英勇牺牲。

第52团指战员的英勇行动，为红六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贺龙对红六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湘西敌军及黔军的阻拦，率红三军主力兼程南下，接应红六军团。红六军团主力于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

（田仁来）

## 军史文物

### 承载东北抗联精神的靺鞨

靺鞨，是满族人发明和使用的一种防寒鞋，通常由兽皮或畜皮缝制而成，鞋里絮上乌拉草，既舒适又暖和。抗日战争时期，靺鞨是部队冬季作战的重要装备。一双双靺鞨陪伴着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穿行于白山黑水、战斗在茫茫林海，见证了东北抗联将士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东北抗联精神的承载。

1933年10月10日，在珠河县铁道南的三股流，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正式成立。作为哈东地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初创之时就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行动中，他们一方面与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力量联合，积极斗争扩大游击区；另一方面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促进军民关系。游击队通过一系列战斗行动，打击了当地反动武装和汉奸地主，战斗缴获除满足游击队生存、战斗基本需求外，主要惠及当地百姓。部队每到一处便首先召开群众大会，严明军纪，互帮互爱，很快，游击队的政治、军事影响得到扩大，赢得群众的爱戴与支持。

到了初冬时节，群众发现游击队的一些战士连过冬御寒的鞋子都没有，便买了几双靺鞨，由百家长（也称甲长，相当于村长或屯长）送给游击队战士。赵尚志想拿钱买下这些靺鞨，可百家长坚决不收。赵尚志耐心解释道：“我们拿枪打仗是抗日，您替我们买东西、支援游击队，也是为抗日作贡献。游击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咱们团结起来，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赵尚志的一席话，让百家长十分感动。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群众真切感受到游击队纪律严明、爱护百姓，是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

众所周知，东北抗日战争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极端困难”来自于凶恶无比的斗争对象和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自日本侵略东北开始，日军强制推行归屯并户，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制造“集团部落”和“无人区”，以法西斯统治和暴力割裂东北人民与东北抗联部队的联系，企图饿死、困死东北抗日联军。日伪军数次发动疯狂的“大讨伐”，采取重兵“围剿”的方式向东北抗日联军展开进攻，以残酷毒辣的手段“扫荡”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破坏抗联营地和仓库。到了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东北抗联部队的生存和战斗环境更加严峻。为抵抗饥饿，抗联将士只能以草根、棉絮、树皮充饥，连抵御严寒的靺鞨都成了果腹之物。据抗联战士李敏回忆，1939年的大年三十，由于抗联部队长时间没有粮食补给，一名指导员把自己的牛皮靺鞨交给司务长，为同志们煮一顿热粥当作年夜饭。然而，靺鞨汤还没煮好，敌人的枪声就响起来了，司务长为保护这顿珍贵的“年夜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茫茫白雪掩映的是流淌的鲜血与滚烫的年夜饭，东北抗联将士只能化悲痛为力量。

抚今追昔，睹物思人。靺鞨作为东北抗日战争的文物之一，与那段抗击侵略的历史同在，它承载的坚贞不屈、勇敢顽强、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抗联精神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御寒和充饥的实用价值。

（王凤春 白雪）

## 战争岁月

### 哈东支队少年连深夜歼敌

1932年9月，李福林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到黑龙江珠河县，按照省委指示，改组珠河县委为珠河中心县委，并任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其间，李福林在珠河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反日宣传，建立反日会、反帝同盟等组织。同年秋，李福林和战友们在珠河县蚂蝗河外组织了一次有1000多农民参加的反日游行示威。

1933年初，李福林根据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开始组建珠河地区抗日武装，先后派多名共产党员进入义勇军孙朝阳部，宣传抗日道理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帮助他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1933年3月，赵尚志也加入孙朝阳部，后被委任为参谋长。

同年10月，日伪当局派特务潜入这支义勇军部队，诡称关内义勇军反援会工作人员，诱骗孙朝阳部队“领取给养”，赵尚志、李启东苦心规劝，孙百毅不依。日本特务伙同叛徒企图刺杀赵尚志等，赵尚志、李启东等识破敌人的阴谋，迅速携带一挺机枪和11支手枪、步枪撤离，并与李福林取得联系。

李福林闻讯后，和战友带着两支手枪和冬装赶来接应。不久，朱河中心县委又派来了几名同志，和赵尚志、李福林等汇合，组成了一支13人的队伍。10月10日，李福林协助赵尚志在珠河县三股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推选赵尚志为队长，李福林任政治委员兼党支部书记。

不久，游击队在三股流消灭数名欺压群众的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受到群众的拥护。仅仅3个月，游击队就扩大到70多人，有机枪2挺、手枪13支、步枪60余支。到1933年冬，游击队已经初步确立了以三股流为中心的珠河反日根据地。1934年初，游击队发起攻打黑龙宫的战斗；5月，又发起了攻打宾县县城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反动统治。

1934年6月28日，在珠河铁道上柳河子，李福林和赵尚志根据上级指示，主持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29日又召开了指战员大会，宣布正式编成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下辖3个总队，共450人，由李福林任党委书记，赵尚志为支队长，李兆麟任政



委，全队90多名党团员成了部队的骨干。支队下还设有骑兵队、教导队、少年连。当年9月，哈东支队攻克重镇五常堡，缴枪90余支。在随后的时间里，哈东支队频频出击，把游击区扩大到了方正、通河、延寿、宾县等地。这年冬天，李福林率少年连百余人来到方正县筒子沟开辟新的游击区。这一天，侦察员回来向李福林报告：伪军200多人受日军差遣，进山“扫荡”，扬言要“消灭哈东支队少年连，活捉李福林”。李福林得到报告后，立即把少年连集合起来，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当夜200多名伐木工人也主动要求参加攻打伪军的战斗。随后，他又与从五常县山里赶回来的赵尚志一起研究了作战方案。两人决定，把主战场设在伪军进入筒子沟的必经之路——砬子山下。这里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为了迷惑敌人，李福林、赵尚志事先“放风”说：少年连要休整两天后才能和伪军“较量”。伪军得知这个消息后，果然中计，立即下令，准备在当夜出发，妄图“全歼少年连”。当晚，李福林和赵尚志带领少年连及200余名伐木工人，在夜幕掩护下，及时进入伏击地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午夜时分，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进入距离筒子沟仅三四里远的地点。李福林、赵尚志见敌人已经“上钩”，立即下令让少年连战士做好战斗准备。

不久，伪军举着火把、手电筒进入砬子山伏击圈，李福林、赵尚志一声令下，伐木工人立即把大木头、石头从山上推下去，少年连战士投出的手榴弹也在伪军队伍里开了花。伪军受到突然打击，在黑夜中惊慌乱窜。李福林、赵尚志见时机成熟，端起机枪，当先冲入敌阵。少年连战士和伐木工人冲向敌群，很快击毙伪军数十人。

战斗很快结束，此次战斗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当地伐木工人的配合下，全歼了进犯伪军（仅在最后的十几个敌人骑兵漏网），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贾晓明）

## 中华英烈



### 王宗槐中将：干部工作的“活辞典”

开国中将王宗槐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1930年参加红军。他长期从事军队组织干部工作，是我军青年工作和干部工作的开拓者，被誉为干部工作的“活辞典”。

#### 我军干部工作的开拓者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宗槐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宗槐任职后，聂荣臻经常询问干部情况，在问到某个干部时，聂荣臻总爱问：“哪儿人？哪年参军的？任职多长时间了？有啥特点？”起初为防备查问，王宗槐总爱将这些情况记在一个小本本上。有一回，他边翻边答，支支吾吾，忙作一团。聂荣臻以平静的目光望着他，严肃的表情中透出一丝不快，轻声慢语地说：“要记在脑子里。”

聂荣臻的这句话使王宗槐看到了工作中的差距，此后，他改变用小本本记录的方法，时时处处做个有心人，努力在用脑记忆上下功夫。他认为多跟干部谈心是熟悉了解干部的好方法，借助开展活动，给外来干部分配工作、给慕名而来的知识分子政审等机会逐一和干部谈心，了解他们的籍贯、家庭、爱好、经历等，每次谈完都回顾回想，直到记住，并在脑子里留下初步印象。一有空闲和机会，他就尽可能参加干部会议尤其是学习讨论会，通过与会者的发言进一步了解。他还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掌握干部的工作业绩、水平能力和优点缺点，进一步加深印象。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不懈努力，他对军区营以上干部情况基本做到了如指掌，为选配准备好干部、提高干部使用的效能和精准性准备了良好前提。

#### 干部工作的“活辞典”

百团大战中日军吃了苦头，为了扭转战局，1941年8月调集7万日伪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展开疯狂的报复性进攻。一场大战之后，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了平山县的陈家村，刚刚住下，就接到上级要求上报营以上干部名册的电报，条目不多，包括姓名、部别、职务这三项。当时，组织部的干部科都有科长，唯独干部科科长由部长兼任。由于2名干事到职不久，不熟悉情况，手头连花名册都没有，工作起来难度较大。

作为军区级组织部门怎么没有干部花名册呢？这是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1939年秋，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反“扫荡”时，政治部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烧掉了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庄稼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三尺，把它挖出来了，暴露了晋察冀部队的一些实力。聂荣臻知道后指示说：“往后，反‘扫

荡’前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后再填表、整理。”后来的几次反“扫荡”，军区组织部门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次刚打完仗还没来得及布置填表，八路军总部就要求上报，临时制表发下去再汇集上来，时间来不及。王宗槐拿着电报，面对白纸一张的干部资料，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场考验呀！”

他沉思一会儿，对正急得抓耳挠腮的2名干事说：“我来写，你们誊清，考考看，能得多少分。”说干就干，他拿出笔，把军区机关、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名单一一列出。然后，又把军区所属5个军分区的营长、教导员、团特派员、总支书记、机关股长、科长、协理员等营以上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一一列了出来。另外2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跟在后面抄写，3人一齐努力，仅用了5个小时，一份全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就造成了，总计近2000人（因部队人数以萧克领导的冀热察挺进军和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按惯例自报，不计在内），与实际一个不差。军区机关许多同志为之一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扬王宗槐“记忆力好”，是干部工作的“活辞典”。王宗槐自己说这都是在聂荣臻司令员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锻炼培养出来的。

#### 政工战线上的卓越将领

王宗槐后来从事组织干部工作多年，一直把握干部信息情况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抗战胜利后，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军区所在地张家口成了延安方面和晋绥、晋察冀军区赴东北干部的中转站。作为组织部部长，王宗槐每天都要接待三四十名过往干部，短短两三个月中，他经手的中转干部少说也在2000人以上。在



安排吃、住等问题的同时，凭着工作习惯和职业敏感性对中转干部进行了基本了解和熟悉，为以后从事全军干部工作打下了基础。知情者回忆说：“抗战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发展得那么迅速，那么有利，张家口的干部中转站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这是对王宗槐工作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王宗槐从63军政治委员的岗位调任总政治部“一任三兼”，任青年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总政秘书长。具体工作中，王宗槐忠实地贯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坚持的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原则，发挥干部“活辞典”的内功潜能，选人用人坚持五湖四海，既从红军四个方面军、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又从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军区和各个野战军选拔干部，实现罗荣桓主任提出的“可以广泛交流经验，便于从各个方面了解熟悉情况，有利于我军的建设”的目的和意图，对建立干部队伍才正确流动机制、增进干部工作活力、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王宗槐被授予中将军衔。

（魏新玲、郭云）